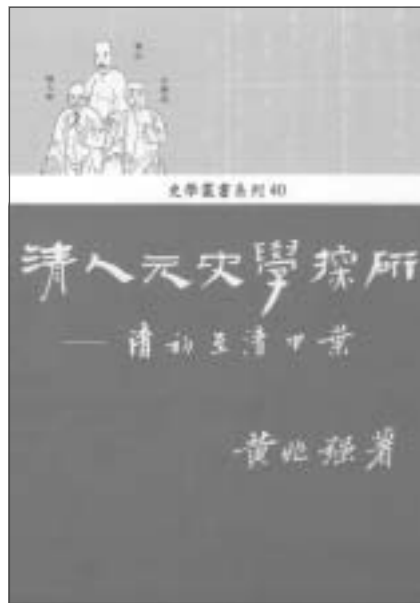


台灣學人的史學研究管窺： 以《清人元史學探研》為例

● 賈慶軍



黃兆強教授的《清人元史學探研》是一本內地學者鮮有提及的著作，但在筆者看來，它恰是台灣學界歷史研究的典型代表。《探研》一書集中展示了劉知幾所說的史家三長，即「才、學、識」，而這正是不少台灣學人研究歷史的特點。

黃兆強：《清人元史學探研——清初至清中葉》（台北：稻鄉出版社，2000）。

台灣學界的史學研究向來為內地學界稱道。筆者也經常接觸到台灣學人的學術著作，但卻只局限於書本的間接交流，從未進行直接對

話。一個偶然的機會，筆者有幸到台灣訪學，得以親身接觸到台灣學界同仁，同時也更加深入地了解他們的學術著作的內涵和特徵。在這裏，筆者欲藉一本史學著作來一窺台灣學人歷史研究的特點，這就是黃兆強教授的《清人元史學探研——清初至清中葉》（以下簡稱《探研》，引用只註頁碼）一書。這是一本內地學者鮮有提及的著作，但在筆者看來，它恰是台灣學界歷史研究的典型代表。

黃先生畢業於香港新亞研究所，師從著名哲學家、思想史家、現代新儒家的代表人物唐君毅、牟宗三、徐復觀先生。在法國巴黎大學獲博士學位，師從國際漢學界泰斗謝和耐 (Jacques Gernet) 教授、桀溺 (Jean-Pierre Dieny) 教授、施舟人 (Kristofer M. Schipper) 教授。現為台灣東吳大學歷史系教授，研究領域為中國史學史、史學方法、中國歷史文獻學、清代學術史、當代新儒家研究，《探研》是其成熟和代表之作。筆者認為，《探研》一書集中

展示了劉知幾所說的史家三長，即「才、學、識」，而這正是不少台灣學人研究歷史的特點。下面我們將就此書詳細展開論述。

一 「才、學、識」之展示

(一) 才學之充沛

在《探研》一書中，作者的史才和史學得到了充分的展示，具體表現如下：

第一，語言運用靈活。這表現在《探研》語言運用的二重性上，即客觀語言和主觀語言的使用。在陳述歷史事實和進行考證時，黃先生盡量使用客觀語言。這種客觀語言和自然科學語言一樣，具有客觀性、清晰性和必然性。在解釋歷史人物的動機和行動時，則使用了大量豐富細膩而富有激情的語言。

語言的雙重使用保證了歷史研究的雙重客觀性——自然歷史事實(結果)的客觀和主觀情感事實(歷史動因和過程)的客觀。這正應合了闡釋學大師伽達默爾(Hans-Georg Gadamer)的話：主觀闡釋也許比客觀自然科學方法更接近歷史真實，因為歷史涉及的就是人的主觀性^①。當然，伽達默爾也有偏頗之處，就是將歷史處理成了單一主觀之歷史。而黃先生正是意識到了歷史研究的雙重客觀性——自然事實客觀性和主觀情感客觀性，才使用了兩種不同的語言來進行敘述。

第二，寫作結構精心設計，寫作體例細密完善。在寫作結構上，為了全面展示清人元史研究的深度和廣度，黃先生採用了焦點透視和

點面結合的寫作結構。他選取邵遠平、錢大昕、汪輝祖、趙翼這四個人物為焦點，在此基礎上，又延伸論及其他清代學人的元史研究，如孫承澤、畢沅等，因而著有元史專著的清代學者幾乎被一網打盡了。更令人欽佩的是，黃先生在最後還將明代的元史研究進行了一番考述，其對歷史研究完整性和完善性的追求可見一斑。

在寫作體例上，作者也盡可能地考慮其完整性。在論述每一具體章節中的代表人物和代表作時，《探研》首先介紹人物的生平和著述，然後着重分析其元史代表作。在對代表作(主要是四個代表人物之作品)進行分析時，也有一個普遍的研究順序，即先探討其撰述的動機^②，然後討論作品的體例、特點和貢獻，其中穿插作者對其得失之評價。對於同時是思想家的史家，如錢大昕和趙翼，作者還着重分析了其思想。為了更深入分析每部作品的體例、特點和貢獻，在一般程式之外，作者又採用了豐富多樣的研究和分析方式，如對每個代表人物的寫作體例和考證方式進行研究時，採取了不同的概念形式和概述方式，這就使表述更豐富和恰當，更能契合每部作品的特點。如在研究錢大昕之《元史考異》時，作者着重論述其考證表述方式；對趙翼的《元史劄記》，則着重歸納其考證史法(頁42-64、130-50、324-35)。

第三，考證精細和深湛。這具體體現在《探研》資料的豐富和作者本人知識的廣博上。在材料方面，黃先生試圖完整呈現清人的元史著述情況，從本書所附的「清人元史著作一覽表」中(頁9-12)，我們看到

黃先生採用了焦點透視和點面結合的寫作結構。他選取邵遠平、錢大昕、汪輝祖、趙翼這四個人物為焦點，在此基礎上，又延伸論及其他清代學人的元史研究，如孫承澤、畢沅等，因而著有元史專著的清代學者幾乎被一網打盡了。

對黃先生來說，題目的選擇，文獻的收集、整理和考證，歷史知識的積累等無不為一個目標服務，那就是洞悉歷史之活的精神和靈魂，也即歷史中存在的規律、義理和思想。這裏的「史意」，也就是「史識」。

作者對文獻的熟識程度。同時，作者對具體的代表著作進行考證分析的過程，顯示出其深厚的考證功力，最具代表性的例子是對錢大昕《元史考異》一書所用文獻的詳細考證（頁167-82）。作者知識的廣博亦體現在其對各著作的優缺點之評價上，如對邵遠平《元史類編》體例的討論、對汪輝祖《元史本證》的糾誤，以及對趙翼《元史劄記》的商榷。

（二）史識之深邃

在與黃先生相處的時日中，筆者多次聽他講到中國傳統史學的核心特徵，那就是「史意」。在2012年6月底上海召開的「民國（1912-1949）史家與史學國際學術研討會」上，筆者再次聽到黃先生對史意的強調。這使我們得以清楚地了解其治史的宗旨和核心思想。對黃先生來說，題目的選擇，文獻的收集、整理和考證，歷史知識的積累等無不為一個目標服務，那就是洞悉歷史之活的精神和靈魂，也即歷史中存在的規律、義理和思想。這裏的「史意」，也就是「史識」。在《探研》這本書中，黃先生對史識的追求並未被其強大的歷史考證功力所淹沒，考證的精細和深入使其得出的史識更顯得瓜熟蒂落、水到渠成。茲列舉例子如下：

第一，在闡釋幾大學者的學術動機之時，黃先生力求走進人物之內心，深入把握人物真實的精神和心理。例如，在闡釋邵遠平的著述動機時，他並沒有盲從當下泛濫的「學術經世」、「文章報國」等崇高之志的貧乏解釋，而是運用大量文獻資料證明邵氏編撰《元史類編》的動

機是多元的，至於報國之志則未見顯露於其言語中（頁38-42）。

《探研》對錢大昕撰元史動機之闡釋，更顯示了黃先生對思想闡釋的獨特視角。他首先談到了錢氏之好名，讓人以為這是其主要動機，但是好名不一定要作史，也可以從經學着手。好名和作史似乎沒有必然關聯。接着，他又提出了「求道之動力」說，並就此討論當時經史求道之熱潮（頁92-93）。但是求道也並不必然和治史有聯繫，治經來得更便捷。在此黃先生筆鋒一轉，開始探討錢氏治史的淵源。在梳理當時的經史之爭時，他詳細考證了錢氏對治史的看法，在其中，點出錢氏暗藏之「經易史難」之觀點。既然「經易史難」，錢氏完全可以從易處着手來成就一番功名，而且當時大多數人皆循此成名捷徑，為何錢氏捨易從難呢？由此，黃先生順理成章拋出了其深思熟慮之觀點，即錢氏的「克難精神」和「豪傑意識」（頁102）。如此層層剝離、柳暗花明之敘述，對讀者來說無異於在讀一本偵探小說，其懸疑和推理的層層推進引人入勝。對錢氏動機之深入發掘顯示了黃先生治史求真求切之態度，他不滿足於表面的各種現象，而是深入各種歷史細節中，尋找其內在的、深層的聯繫及核心，最終找到錢氏最根本、最原始的動機。《探研》對於汪輝祖、趙翼之動機交代也是如此，力求貼近歷史和人物之真實面目，茲不贅述。

第二，在研究中，黃先生對史家之思想一直很重視，尤其是對錢大昕、趙翼兩人思想的研究，可說是其書的重中之重。

首先，在錢大昕思想的研究中，黃先生提出了「學術經世」這一

新穎概念。在前人關於錢氏史學之經世致用精神的研究基礎上，黃先生作出進一步的闡發和剖析，將「經世致用」這一概念的多個層面清晰而詳細地描述出來。據他的分析，經世致用可分為五個層面：一為烈士起義之革命行為；二為針砭時政，口誅筆伐、毫不妥協；三為積極參與時政，成為施政精英，落實經國濟世抱負；四為埋首故紙堆，以隱微言辭抒發淑世抱負；五為以純學術之研究闡析人倫日用之要旨，希冀移風易俗，並待聖王惠顧。按照這一分類，前三種是明顯的政治行為，其特徵都是力求取得立竿見影之政治效果，而後兩者則可看成是文化或學術行為，是借助於或隱或顯之文字或研究，表達自己對理想社會或生活樣態的看法，其特徵並不是取得立竿見影之效果，它甚至不是為某個特定朝代而做，而是追求一種長遠的或終極的理想。黃先生稱後兩者為「學術經世」，錢氏所為正屬於這兩者（頁109）。在黃先生的近著《學術與經世——唐君毅的歷史哲學及其終極關懷》中，他又將這一殊榮歸於唐君毅^③。

在黃先生看來，錢大昕的史學研究結合了客觀考證與道德評價兩者。客觀考證是基礎，道德評價則為最終目的。雖然黃先生很佩服錢氏史學中的這種整體結合，但他還是指出了其思想中的某種時代局限性：錢氏思想中有某種進步開明之一面（崇尚事實、注重科學、君主無道則可能被弑，參見頁112、118、109-10）；也有其迷信保守之一面（男尊女卑之保守、一乳三子之迷信，參見頁111-12、120-21）。這也恰表現了黃先生「愛而知其惡」之客觀精神。



黃兆強近著《學術與經世》就是其將「求真意識」和「致用意識」完善結合的一次嘗試

其次，黃先生着重討論了趙翼歷史研究中的正、負兩方面思想。在他看來，趙翼的「正面思想」，主要體現為其鮮明的「道德意識」，這一意識在史學研究上則表現為「為史如實」（盡力重建史實之真相）、「施褒貶」（誅奸諛於既死、發潛德之幽光）、「求致用」（治史以着眼於人類未來之良性發展為終極關懷）。其「負面思想」，主要體現為迷信，深信玄怪之聞見，亦相信天道天命對人事之支配（頁297）。《探研》用了較大的篇幅來闡釋趙翼這兩方面的思想（頁298-308、311-15）。

再次，在對趙翼思想之分析中，《探研》提出了「史膽」、「史情」之概念。在討論趙翼之「道德意識」在歷史研究上的貢獻時，黃先生聯想到劉知幾之「才、學、識」和章學誠之「史德」思想。正是在討論史家「才、學、識、德」之四長時，黃先生提到了「史膽」、「史情」之概念。按黃先生所言，這對概念是其多年思考和體會之結果。這對概念暗合了西方現象學還原理論或發生學原

「史膽」、「史情」（或真性情）從發生邏輯上看應該是先於「史識」的，在很大程度上決定「史識」的方向和深度。因此，這對概念補充和深化了史家「才、學、識、德」四長之理論，使其更加完善和充實。

黃先生將趙翼之「道德意識」歸於主體自覺，而將「天道天命觀」歸於宿命論，從而認為後者比較負面。須知主體性恰是現代科學和理性的基礎，是現代之產物，以之作為判斷先進和落後的標準，說明他向現代思想和價值觀念讓了步。

理，即對事件或觀念的前提預設或先驗動力之追索。在當代西方思想大師海德格爾 (Martin Heidegger) 和舍勒 (Max Scheler) 看來，在認識產生之前，其生存的激情或基本情緒更具原初性和本真性^④；而黃先生所強調的恰是一種道德情感或激情，可謂英雄所見略同。黃先生經常提倡「有真性情，才有真學問」^⑤。此「真性情」也就是這裏的「史膽」和「史情」，現在看來，這種契合不是偶然的。此「史膽」、「史情」(或真性情)從發生邏輯上看應該是先於「史識」的，在很大程度上決定史識的方向和深度。因此，這對概念補充和深化了史家「才、學、識、德」四長之理論，使其更加完善和充實(頁306，註30)。

黃先生還提出了其他的一些觀念和思考，如對史家能否好名的思考(頁84)；對古為今用實用主義史學的思考(頁96)；對史家應扮演何種角色的思考(頁108)，等等，限於篇幅，這裏不再一一列舉。

從以上分析中，我們不難看出黃先生對史識的執著追求和深厚的史學理論素養。他不僅深諳古今史學理論之精髓，還力圖在前人基礎上有所創就，俾使經典理論更完善和更具解釋能力。而且，黃先生不僅僅是在口頭上提出這些理論，其自身就是一個積極熱情的踐行者。與黃先生有接觸的學人皆會感受到這一點。

二 幾點看法和商榷

《探研》這本書在「才、學、識」各方面都達到了一個頂峰，可以說是台灣史學界的一本代表之作。不過，作為一篇評論，總免不了吹毛

求疵，所以在這裏列出幾點看法，以向黃先生討教。

(一) 趙翼正面和負面思想的討論

在探討趙翼史學思想時，黃先生使用了正、負兩面的分析方式，並將其正面思想歸納為「道德意識」，負面思想則歸納為迷信玄怪思想。但是，如果我們更深入觀察的話，趙翼這兩方面的思想其實可以歸一，即濃厚而鮮明的道德意識。這從第四章的標題也能看出來，即「清中葉元史研究中最善於歸納及解釋歷史事象的一代大史學家」。趙翼歸納和解釋歷史的依據是天道天命觀，而這本質上就是道德意識。其實，正因為趙翼這正、負兩方面思想的相依相存，使黃先生在作出上述區分時有些猶豫。

當其他學者都站在現代科學立場批判趙翼之天道迷信思想時，黃先生則認為，現代科學思想並不是絕對正確的，也不是唯一的標準。如果說對現代科學的信任也是出於某種信仰的話，那麼和古人對天道天命的崇拜其實是沒有兩樣的，如何能褒此貶彼呢？帶着這樣的深刻認知，黃先生對「負面思想」一詞給出了恰當的解釋，他認為這一概念並不是要否定和貶低趙翼的天道天命思想，而只是為了和現代主流思想(即科學思想)相區別，才暫時以「正面」、「負面」分別名之(頁298，註25)。

不過，黃先生又似乎沒有將古今思想之平等觀念堅持到底，還是區分了趙翼之「道德意識」和「天道天命觀」，並將「道德意識」歸於主體自覺(人之主體)，而將「天道天命觀」歸於宿命論(被歷史支配)，從而認為後者是比較負面的、比較消

極的(頁298,註25)。須知主體性恰是現代科學和理性的基礎,其已經是現代之產物,以之作為判斷先進和落後的標準,說明黃先生還是向現代思想和價值觀念讓了步[◎]。

(二) 天道天命思想與主體自覺思想的討論

在談到趙翼的思想時,黃先生給出了天道天命思想和主體自覺思想的區別,並認為主體自覺思想比天道天命思想要進步。這一論斷牽涉到傳統思想和近現代思想的區別。傳統思想講求的是整體性和自然性,並不突出主體或自我意識。這樣一來,傳統社會中個人理性以及與之伴隨的科技之發展就不太明顯,但其德性之追求卻是十分突出的。近現代思想講求主體性和自我,由此就刺激了理性和科學之發展,人們生活的物質條件因此得以大大改善,但其道德需求卻成為次要的,因此就產生了一系列社會問題。

由此看來,傳統和現代思想各有所長,沒有哪個絕對比哪個更好。而近現代的進化論思想使人們產生了某種極端觀念,認為現代價值和思想都比傳統優越和先進,這可能有些誇大其辭。黃先生顯然意識到了現代思想的局限性,只是在寫作過程中,出於某種原因,不得不迎合現代主流思想,才出現了上述論斷。

(三) 「史膽」、「史情」概念的討論

在討論史家四長「才、學、識、德」時,黃先生提出了「史膽」、「史情」的概念。如上所述,這兩個概念有其貢獻之處,可作為對「史識」、「史德」之補充和完善。

但作為一種相對於「才、學、識」而獨立的概念提出來是否恰當就值得商榷。劉知幾所提出的「才、學、識」三長各涵蓋一獨立領域,這三個領域界限分明、層次清楚,並一起構成史家才能之整體。至於後來章學誠發明「史德」這個概念,許多學者皆認為其屬多餘,因為「史識」這一層面已經包含了其內涵。黃先生對此亦認同。因此,史家四長和史家三長是沒有多大區別的。而今黃先生在四長之外又加上「史膽」、「史情」兩長,就使三長變成了六長。如此添加,雖然使三長的內涵更為豐富和完善,但卻使這一理論的層次感、秩序感有些模糊了。

如果說「才、學、識」三長是構成史家才能整體的一級子目的話,「史德」、「史膽」、「史情」則只可能作為第二子目,因為它們皆屬於「史識」之內涵^⑦。所以,此三者可以作為「史識」的充實和深化而存在,但作為和「才、學、識」三長這一級子目並列之存在,則需再作斟酌。正是出於這種考慮,筆者才仍然採取「才、學、識」三長來展示黃先生在本書中展現的治史才能。

(四) 經世之學的討論

前面曾提到黃先生對經世致用行為五個層面的概括。但這五個層面其實是可以看成一個平面的,即對有形之社會產生有形功效之行為。對經世之學或實學的這種概括,多少受到了現代觀念的影響。當我們放棄現代觀念,回顧人類歷史上產生的經世之學或實學之內涵時,我們會發現,其內涵並不僅僅局限於此。我們至少可以歸納出四種經世之學或實學形態。

史家四長和史家三長是沒有多大區別的。而今黃先生在四長之外又加上「史膽」、「史情」兩長,就使三長變成了六長。如此添加,雖然使三長的內涵更為豐富和完善,但卻使這一理論的層次感、秩序感有些模糊了。

雖然強調三長之融合，但作為史家的黃兆強還是有所側重的，這就是史學之核心和基礎——「學」。這一「學」字也是其所謂的歷史「求真意識」。他強調「求真意識」乃史學之第一要義，切不可為致用而歪曲歷史事實。

一是儒家整體實學。如果說儒學是一種實學的話，它講求的是一種整體上的實學，即渾然天地萬物於一體之實學，此實學無內和外、體和用、已發和未發、形上和形下、經驗和超驗之區分。這也是儒家學說的正統。孔孟、陸九淵、王陽明、劉宗周、黃宗羲等人皆持此學。

二是程朱之理學實學。它將儒家整體之學分成了兩段而強調天道的重要性，這是儒家整體實學的一種變型。

三是所謂的經世實學或事功之學。它是儒家整體實學的另一個變種。這種實學強調從現實有形和固定之物出發建立自己的法則和規範，也即將天地一體分為兩段，只從地出發來安排打理。但其又受到儒家傳統天理、人欲思想的影響，強調人的道德性。因此，從現實之物出發形成的是一種新型的義理學或禮學。陳亮、泰州學派、陳確、潘平格、萬斯同、戴震、顧炎武、王船山等皆持此學。

四是現代功利實學。如果說前三種實學類型多少還有些關聯的話，這一種則是和前三種截然不同的實學類型。這種實學將人和物、主體和客體、社會和自然區分開來，以人及其組成的社會的力量對自然的駕馭和征服為主要特徵。其出發點既不是天也不是地，在這裏已經沒有天地之分，只剩下了唯我獨尊之人。天地只是人所挑戰和征服的對象。人憑藉科技的力量向整個宇宙宣戰，要以一個完全人造的世界取代自然之宇宙。現代功利實學背後是人之私欲的大釋放。

黃先生所持經世之學的概念，似乎是第三、四種實學的融合，而

對第一、二種實學則涉及不多。第三、四種實學概念稍顯片面和極端，而第一、二種實學恰恰是試圖從整體的角度來看待世界。

三 結語

通過這本書也大體讓我們一窺台灣學人歷史研究的成績和特點。1950至70年代，台灣史家繼承了傅斯年等老一輩學人的史學傳統（即史學就是史料學），在史學考證和文獻整理方面做出了卓越貢獻。這些成就正可對應於「才、學、識」中之「學」。但他們不滿於僅僅停留於「學」，力圖兼具「才、學、識」，所以在1970年代之後，部分受西方後現代主義思潮和詮釋學的影響，台灣史家中逐漸出現了將「才、學、識」融會貫通的趨勢，即在原來考證基礎上，嘗試以現代心理學和詮釋學方法來解釋歷史。具有代表性的是余英時的思想史研究，如其《論戴震與章學誠：清代中期學術思想史研究》和《朱熹的歷史世界：宋代士大夫政治文化的研究》等^⑧。而黃兆強先生的史學史研究也是其中的典型。雖然強調三長之融合，但作為史家的黃先生還是有所側重的，這就是史學之核心和基礎——「學」。這一「學」字也是其所謂的歷史「求真意識」^⑨。

黃先生曾提到史學之真理觀大致可歸納為兩種：一是求真意識，一是致用意識。「求真」是史學的根基，而「致用」則是史學的終極關懷，史家最高境界是將兩者完美結合，但如果做不到的話，就寧可求真而不求致用^⑩。在這一意義上，

黃先生才強調「求真意識」乃史學之第一要義，切不可為致用而歪曲歷史事實^①。他明確聲稱：「把求真視為史學的第一要義，這是我個人的價值取向而已。很多史家認為史學的第一要義是要為現實政治或社會服務；重建歷史真相，並不是他們的重點。」^②所以，在《探研》這本書中體現的就是黃先生的這一歷史真理觀，其求真考證之篇幅是佔絕大部分的。在這一求真意識下，先入為主的判斷和觀念就要被擱置起來，所有價值判斷都要待歷史真相明瞭之後才可做出。要說此書是「才、學、識」之融會貫通的話，也是在「求真意識」指導下的統一。

這種求真之堅持對當下內地學風之重建有着很大的意義。當下內地學界對「致用意識」的追捧幾乎到了趨之若鶩的地步，「求真意識」簡直成了奢侈品。實用主義史學之泛濫導致學風浮躁、學術品質下降。在產量大爆炸的同時，品質卻大幅滑坡，與海外學術水準之差距愈來愈大。所以，重現史學的求真意識，實現真正的「才、學、識」之融會貫通，是學術界當務之急，而這也是筆者向內地學人介紹此書的主要原因所在。

註釋

① 伽達默爾 (Hans-Georg Gadamer) 著，洪漢鼎譯：《真理與方法：哲學詮釋學的基本特徵》，下卷 (上海：上海譯文出版社，2004)，頁692-711。

② 四個代表人物中，惟沒有對趙翼之撰述動機深究，大概由於黃先生已在其專著《廿二史劄記研究》中對此有詳論。參見黃兆強：

《廿二史劄記研究》(台北：台灣學生書局，1994)，頁9-75。

③ 黃兆強：《學術與經世——唐君毅的歷史哲學及其終極關懷》(台北：台灣學生書局，2010)。

④ 海德格爾 (Martin Heidegger) 著，陳嘉映、王慶節譯：《存在與時間》(北京：三聯書店，1999)，頁156-63；舍勒 (Max Scheler) 著，劉小楓選編，林克譯：《愛的秩序》(北京：三聯書店，1995)，頁17-29。

⑤ 黃兆強：〈偉大史家眼中的偉大歷史人物——徐復觀評蔣介石〉，載《民國(1912-1949)史家與史學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》，未刊稿，頁175。

⑥ 在本書其他地方，黃先生也依然在為趙翼之天道天命思想辯護，如他認為趙翼所說的「天」、「天意」、「氣運」表面上很玄，也不科學，但其實是和現代某些思想相合的。其所謂「天意」、「天道天命」等概念類似現代人所說的「大勢」、「趨勢」、「潮流」、「大環境」、「客觀環境」等概念，其某些思想是相當敏銳和合理的 (頁301、302)。所以，黃先生是否徹底倒向現代價值觀還有待商榷。

⑦ 承蒙黃兆強先生指教，他認為「史情」也可以涵納在「史才」概念裏。筆者深為贊同。

⑧ 余英時：《論戴震與章學誠：清代中期學術思想史研究》(台北：華世出版社，1980)；《朱熹的歷史世界：宋代士大夫政治文化的研究》(台北：允晨文化實業股份有限公司，2003)。

⑨⑩⑪ 黃兆強：〈史學上的真理與方法——從西方史學發展史考察〉，《東吳哲學傳習錄》，1993年第2號，頁203-32、220-22、228，註39。

⑫ 黃先生近著《學術與經世》就是其將「求真意識」和「致用意識」完善結合的一次嘗試，對於此書，筆者將另文介紹，茲不贅言。

當下內地學界對「致用意識」的追捧幾乎到了趨之若鶩的地步，「求真意識」簡直成了奢侈品。所以，重現史學的求真意識，實現真正的「才、學、識」之融會貫通，是學術界當務之急。